



每一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假期生活,以及一份最“流行”的“暑假作业”。

# 那一年,我的“暑假作业”

■本报实习生 许悦 记者 陈彬

不久前,成都文理学院教育学院一份暑假实践任务表在网络上“火”了。

在这份有“最贴心暑假作业”之称的任务表里,“跟喜欢的人表白”“去听一场偶像的演唱会”成为了学生们在暑期要完成的“暑假作业”。

如此有个性的暑假作业,自然是为了配合“95后”乃至“00后”的独特个性而产生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每一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假期生活,以及一份最“流行”的“暑假作业”。

那么,在今年的暑期刚刚开始之时,我们不妨回头,看看曾经的大学生都有着怎样一份属于他们的“暑假作业”。

## 1980—1990:学习健身要两不误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时候,十年“文革”的浩劫已经过去,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开始全面恢复,祖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曾经备受打击的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春天。

陈洁泳(化名)就是在这片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1979年,走进大学校园的。

“由于历史、政治原因,我们那代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勤奋的一代,因为我们在知识上欠缺的太多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陈洁泳说他的初中阶段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候,北京没有高中,想学习都无处可去。因此,在考上大学后,我的很多知识还是需要自己来弥补,学习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应该说,将“学习”作为自己暑假重要任务的远不止陈洁泳一个人。“我们1978、1979这两届学生都很勤奋,学风浓厚。大家在暑期都以学习为主。”

当然,除了学习之外,陈洁泳也有着自己的课余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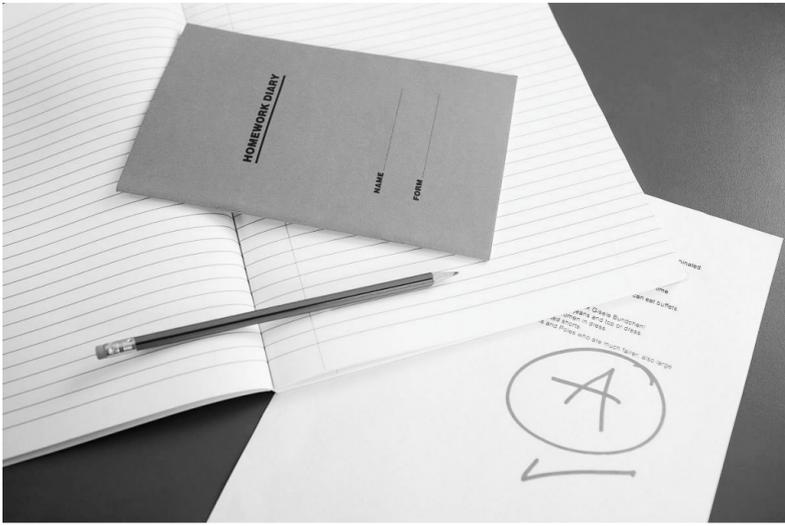
“那时学业很重,但我的身体又不太好。因此,暑假除了看书学习以外,我又重拾童年的特长爱好——游泳来作为调节。”陈洁泳从小就特别喜欢游泳,甚至还参加过游泳队,但后来由于身体原因而中途放弃了。然而,在大学暑期,他重新恢复了自己的这一爱好。

那时候,游泳是陈洁泳和身边很多同学暑假最便利的消暑、锻炼活动。因为相比现在,那时的他们在这项运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有着足够的河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这些河湖里,还允许这些年轻的学子畅游一番。

在书桌前吱呀作响的风扇声和河畔鼓噪的蝉鸣声中,历史的车轮碾过10年,进入了上世纪90年代。

## 1991—2000:实习和旅行都是好选择

王行(化名)如今的身份是北京工商大学的一名副教授,而20多年前的1995年,她还是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名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

彼时,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已经过去3年,“下海”早已成为“流行词汇”,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即将席卷全国。这些社会的新变化,也影响着像王行这样的大学生原本平静的暑期生活。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广告学专业。因此,在大学的暑假,我就开始去不同的广告公司实习了。”这是王行第一次进入企业实习,自然也给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做调查问卷,第一次做调研,这些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广告学专业必须经历的。”王行说,广告专业的实践性很强,学生不仅要会给别人做策划,还必须去跟消费者直接接触。所以,当她接到这样的实习任务时,她没有半分犹豫地就去了。

虽然在王行进入大学的前一年,中国刚刚进入了互联网,但对于当时的王行来说,那条只有64k的专线无疑距离自己还是太过遥远。“那时网络还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们没有网络上问卷,只能亲自走上街头去发放、回收。”然而,她更庆幸的是,那时候的“民风”更加淳朴,没有如今大街上的问卷泛滥。面对陌生人的询问,人们也更热情回答。因此,王行的问卷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次实习经历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程,收获很大。”

必须强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实习还远不像如今这样流行。对于王行和她的同学来说,就业压力也远没有如今的大学生这样大。“就算你不实习,毕业也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因此,王行的很多家乡距离学校比较远的同学,由于放假回家时,几乎要横跨整个中国,所以他们会选择一边旅游,一边回家。

当然,那时候的学校也不会安排很多暑期活动。“比如夏令营之类,即使有一些,对此关注和参与的人可能也不多。”那时候,大学还没实行扩招,进入大学的“天之骄子”还都学习劲头十足。大学里也没有诸多对学生的督促,在假期里,他们可以悠闲地看看书,悠闲地四处逛逛。

在体验实习的忙碌和踏遍山川的悠闲中,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过去了。

## 2001—2010:了解社会是一种情怀

新世纪的前十年,“扩张”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主旋律”,这源于20世纪末,国家作出的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决定。

直到今天,对于“扩招”的利弊问题,依然有人在争论不休。然而,无论如何争论,有一个事实是难以改变的——扩招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走进大学的校园,而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又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暑期他们的主要工作只有一个——打工。

来自贵州的2001级大学生杨显镇便是当年大学生打工大军中的一员。

“对于我来说,大学三年的假期都是在打工中度过的。”采访中,杨显镇说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于是,每年暑假,他需要通过做家教、勤工俭学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不过对他来说,这样的暑假并不会因为打工而感到疲惫,反而让他精力旺盛,感觉“很充实”。

在采访中,杨显镇坦言,在当时,自己身边的朋友、同学利用暑期实习、打工者并不在少数。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就在杨显镇进

入大学的第二年,北京某媒体对在京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被调查学生中,有76%的学生有打工经历,其中有45%的学生在大一时便开始了打工生涯。

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多年的杨显镇早已不是那个烈日下匆匆而行的暑期“打工者”。然而,回忆自己的那段时光,他依然感慨良多。

“这三年的时间里,日复一日的家教工作不仅锻炼了我的人际交往能力,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家庭,贫穷者有之,富有者亦有之。我接触到了社会,明白了在这个大城市的霓虹灯下,在城市的边缘,也有很多人的生活是很无奈的。”杨显镇说。

在闪烁的霓虹和渐行渐远的背影中,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

## 2011年至今:大胆尝试体会多彩人生

如果说在此前的30年间,中国大学生的暑期生活还相对单调的话,那么,随着“90后”成为大学生的主体,大学暑期生活也随着这些更具个性的大学学生的到来,变得日趋多姿多彩。

戴洪同2014年进入了大学校园。在她成为大学生的这几年,“个人喜好”成为了她以及她身边大部分同学安排暑假活动的主要依据。“我身边有的同学属于恋家型,基本上放假后就会回家,各种实践活动也都在家附近完成。也有一些同学则正相反,会出国或者独自旅行。”戴洪同说,她个人属于比较喜欢接触社会的“实践型”,因此,她的假期生活主要有三种活动:实习、参加志愿者活动以及准备考试。

“我自从进入大学以来,基本上很少整个暑假都待在家里,一般会到外面参加各种活动。”她说。

戴洪同从大二开始便参加各种实习,目的是想体验一种和学校不一样的生活,接触社会,为未来做好准备。而志愿者活动则更加随性,时间也更加灵活。在这些活动中,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她加入AIESIC(全球最大的由青年自主领导的非营利组织)。通过这一组织,她在大一暑假时,就作为志愿者前往印度从事志愿活动。在那里,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印度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印度人民的性格也与我们迥然不同。”戴洪同说,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去印度北部的偏远农村进行调研。“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们挨家挨户地走访调研,并与当地的学生进行交流,还开展了文化汇演活动,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特色。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事实上,如果将“90后”的大学生暑期生活比做一块多姿多彩的画布的话,戴洪同的经历只能算是其中的一抹色彩。在夏日的阳光下,他们或田野调查,体验传统村落的衰落;或义务支教,关心贫困地区儿童成长;或“千里独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体验实习,接触多彩的职场人生……

在未来,在这块本已绚丽多姿的画布上,还会出现怎样令我们眼前一亮的色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 中国大学评论

毕业季遇到什么事最让人?当一些高校毕业生正在忙着搬宿舍、聚餐、拍毕业照时,有些学生却在担心自己不能按时拿到毕业证,这让原本十分热闹的毕业季增加了一些焦虑。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影响毕业生拿到毕业证的原因有很多,或许是因为没有完成导师交代的任务,或许是没有按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或许仅仅是因为图书馆的欠款、学杂费用没有交清等。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生在校期间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校应当准予毕业,并在学生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颁发学位证书。”因此,除了对没有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不能在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之外,校方任何因其他非学业成绩因素而扣发毕业证书的行为都是违规的。学校必须纠正这一做法,上级教育管理部门也有责任督促学校纠正违规做法,并追究学校的违规责任。与此同时,还必须分析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毕竟扣发毕业证的事已经存在多年,而且不只是一校的行为。

学生因考试不过关,成绩不合格,没有达到毕业要求,学校是不能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的,这种情形不属于“扣发”毕业证,因为其本身就没有获得毕业证书。而如果已经修完所有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已经被学校准予毕业,但学校却不发放毕业证书,这就属于“扣发”毕业证。总体来看,高校扣发毕业证,都是用毕业证书来要挟学生,以达到校方的某些目的。

要求学生用就业三方协议“换”毕业证书,这一做法最为典型。教育部曾反复发文叫停这种做法,可还是有高校我行我素。原因在于高校希望以此来提高毕业生签约就业率,但靠这种手段提高的签约就业率是有很大的水分的,本质上是弄虚作假,一些学生为了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就去购买假的就业协议书。为此,不但要叫停高校扣发毕业生的违规做法,还有必要调整统计初次就业率的方法,以及把初次就业率与学校办学评价挂钩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思路。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以扣发毕业证来获得就业协议书,也是为了弄出令上级部门感到满意的就业率——当前的就业率是由学校统计,教育行政部门发布,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办学依据。

用没完成导师任务为由扣发毕业证也属于此类。导师布置的任务与学生毕业有关吗?如果有,学生没有完成导师布置任务,也就没有完成学业,当然不能毕业。但如果学生已经达到毕业要求,还要完成导师布置的任务才能拿到毕业证,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导师的私活,或者是学校布置给导师,再让导师布置给学生的学业之外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合理的,学生完全可以拒绝。但面对强势的校方,学生们往往只能忍气吞声。这也折射出我国高校由于缺乏学生自治,而导致大学生没有健全的渠道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维护自身的权利。因此,校方并不尊重学生的权利。近年来,媒体时常曝光高校的变态、雷人校规,这些校规无一不是因学校漠视学生的基本权利,学校校方处于强势地位而出台的。在毕业离校时,学校扣发毕业证不过是雷人、变态校规的继续。

用没交三方协议、没完成导师任务的借口扣发毕业证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也有一些“扣发”学生毕业证的理由得到部分人的支持,因为本身存在一定争议。一条是学生拖欠贷款或贷款尚未还清,学校扣发毕业证,学校要求学生归还贷款后再来拿毕业证。另一条是学生拖欠学校图书馆欠款、学校学杂费,学校要求当事人必须先交欠款和学杂费才能拿毕业证。支持校方做法的人认为,学校要求学生交完学杂费欠款、贷款再来拿毕业证,合情合理,万一给了毕业证,学生就“人间蒸发”怎么办?而反对这一做法者认为,毕业证是毕业证,欠款是欠款,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学生有责任归还欠款,但是学校没有权利扣发毕业证。而且如果学生一离校就失去和母校的联系,也表明他和母校没有任何感情,而母校也没有持续跟踪、帮助其在职业和事业上获得发展。

大学采取扣发毕业证书的方式逼债,只会令学生疏远。然而,大学也有苦衷,因为如果学生就此“赖账”,没有其余的资金渠道补充,学校就得承担相应的损失。为此,这需要专门的基金。国外大学在这方面有不错的做法,因重视校友捐赠而有庞大的校友基金会,这一基金不但支持学校的办学,也用于处理各种与校友相关的事务,由此使大学显得大气、大度。而我国大学则普遍缺乏重视校友资源、发展校友资源的机制,对校友缺乏感情使办学越来越打巴。

治理大学的违规行为,除了依法监管,要求学校纠正之外,还有必要抓根源,包括取消不科学的初次就业率统计——这把所有高校都引导到关注学生就业率,也滋生弄虚作假。推进学生自治,实行学校民主管理,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完善学校帮困助学体系与校友会机构,建立学生发展基金,这有助于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现代治理,树立良好的学校形象。

# 「花式」扣发毕业证折射校园「任性」

熊丙奇

## 现场

# 架一座桥 连两岸心

——2017北科大海峡两岸青年科技交流夏令营侧记

■本报记者 陈彬

“地球上只有两所‘北科大’,一所是大陆的北京科技大学,另一所是台湾地区的台北科技大学。”不久前,来自中国台湾“北科大”的教师王之珊,便跨过那湾浅浅的海峡,来到了位于大陆的“北科大”。这句很有“国际视野”的话,也出自她的口中。

这并不是王之珊第一次来到大陆。事实上,近十年来的每年暑期,她都会在这里。每次与她同行的除了来自本校的学生之外,还包括了来自台湾很多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们。

他们来到这里的只有一个目的——参加由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科技交流夏令营(以下简称“夏令营”)。今年,是这项活动开展的第14个年头。

## 一段历史

梁志扬是北京科技大学负责此次夏令营活动的一名教师。然而,对于夏令营刚刚建立时的一些细节,梁志扬并不是非常清楚。这并不奇怪,毕竟直到2011年,他才开始负责夏令营相关工作。反倒是从一开始便介入其中的王之珊,对于此项活动的“历史脉络”如数家珍。

“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我们这两所‘北科大’之间,就有一些暑期人员的交流活动。”王之珊说,几年后的2003年,台北科技大学帮助北京科技大学开设工业设计系的相关课程,他们便在第二年带领学生来到北科大参加相关的夏令营。慢慢地,参与夏令营的学校和学生日益扩大,直到今年的规模。

那么,今年这一夏令营已经到了怎样的规模呢?

“今年,台湾地区一共有22所高校参与,参与师生数达到了154人。”采访中,梁志扬说,更重要的是,台湾高校的师生对此项活动都非常认

可。“每到一到春季学期开学,台湾相关高校的负责教师都会主动向我们询问,今年夏令营什么时候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北科大举办夏令营的十几年间,夏令营的内容是有一定变化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设定一个主题,让学生根据主题完成一份报告。但这种方式学生的参与度不是特别高。”梁志扬说,而今年的夏令营,他们针对学生参与性和动手能力的提升,为学生们设计了一个组装智能车并进行比赛的项目。

“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项目,有些学生可能很难接触到智能车。对于学生,尤其是非理工科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对此,王之珊如此评价。

## 一场比赛

在夏令营的开幕式上,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希望台湾师生能把北科大当成自己的一个家,并“常回家看看”。那么,台湾学生在这个远在大陆的“家”里,过得怎么样呢?

郑翔翔是台湾屏东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陆,当被问及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他的回答很直截了当:“很不错!”

郑翔翔目前正在攻读的是科技管理专业。此前他就想了解更多大陆方面的环境和市场,这也是他报名参加此次夏令营的重要原因。经过几天的观察,他的感慨颇多:“书本上和真实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感觉台湾的教师对于大陆的发展还不是了解,很多观点甚至有些落后。”至少在他的眼中,北京的软硬件设施比台北还先进。尤其是“感觉北京人都还蛮和善的”。

虽然对北京、对大陆的印象颇好,但有一个问题是郑翔翔必须面对的——他的专业与车辆或机械并无关系,在制作智能机械车的时候,作

为“外行”的他,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此,郑翔翔很看得开:“主体工作确实是由其他更专业的同学完成的,我们只是在一旁帮帮忙。但这也很好啊,我们至少大致了解了解智能车到底是什么,虽然难以了解一些细节,但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原理。”

与郑翔翔有类似想法的还有来自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屈伯俊。虽然他所攻读的专业也有些“不对口”,但从从小就喜欢机械的他还是在团队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对此,屈伯俊同样不以为意:“我觉得对我们更有价值的并不是比赛本身,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这也是夏令营主办方的一个愿望,正如张欣欣在致辞中所说:“本次活动已经成为了连接两岸高校的纽带,加深了北科大与台湾高校的交流。”那么,在这几天的行程中,台湾学生在此交流得如何呢?

## 一种交流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夏令营组织的智能车大赛,是以台湾不同高校的学生为单位,以团队的形式开展的,团队中并没有大陆学生。但为了加强指导,主办方为每个团队安排了北科大相关专业的学生,或者北科大智能车队的队员作为“指导员”,同时还安排了学生充当领队“志愿者”。而两岸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正是从他们之间开始的。

给屈伯俊团队担任“指导员”的是一位准备去中科院读博的北科大学生。“他还是北科大车队的队员,指导程序和组队方面的问题。”屈伯俊说,同时他还认识了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学生志愿



同学们正在制作智能机械车。

者。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环境下的学生由此成为了朋友。“前两天我们还一起去了‘798’艺术区,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北京和他家乡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之外,参加夏令营的台湾学生还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另一层面上的交流,那就是与博大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组织完成智能车比赛只占了此次夏令营总时长的一半左右。剩余的一半时间里,主办方组织他们游览了首都的众多文化历史景点。故宫、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每个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学生们好奇的目光和激动的身影。

在记者采访时,这些来自台湾地区的学生已经游览了包括天安门、故宫等在内的一些古迹。在这中间,给郑翔翔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故宫:“以前只在一些古装戏里见到过,但实际来看,才能真正感觉到它的壮阔。”在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们还要游览长城,对此,郑翔翔更是充满期待。毕竟只有登上了长城,才能算是“好汉”。

事实上,如今的郑翔翔已经不太满足于游历北京了,他的目光已经望向了大陆的其他地方:“除了北京,我还想去上海、济南等城市转一转,看一看那里的风景和城市。”等毕业后,他还很希望能来大陆发展自己的事业。

“未来,谁知道呢?”他说。